

台商投資中國的回顧與展望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一、前言

自 1978 年底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以來，台商赴中國經商投資就絡繹不絕。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的特殊環境，政治經濟糾葛不清，台商的角色及所擔負的風險也難免微妙和不確定性高。三十年來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演化究竟如何？在全球化和新興市場崛起以及中國經社環境的重大變化下，台商又將何去何從？政府應當扮演何等角色？本文由台商對中國投資的演化，以及中國投資環境的變化，展望台商投資中國的前景。

二、台商投資中國的回顧

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曾大力依賴外援，尤其是美援和日資，迄對外貿易興起台灣經濟奇蹟出現，逐漸開展「對外投資」，到 1980 年代初期之後，台灣的對外投資已年年大於外人赴台投資。

1980 年代中期起，國內投資環境迅速變化，除了全面勞工短缺，造成實質工資及單位產出勞動成本上升之外，土地使用成本上升、新臺幣價值高升、治安惡化、生活品質低落，以及環保意識抬頭等，使得對外投資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其投資型態與分工方式也明顯改變。

台商赴中國投資是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對外投資的一大特色。為了從事經濟改革，中國自 1980 年代起提供許多優惠條件吸引了大量外來投資，初期因為法令限制，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都是私底下透過香港來進行，官方統計資料並無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及產業。一直到 1990/1991 年，政府才公布法令，使對中國間接投資合法化。自那時起，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及產業分配比例，才正式列入官方統計資料。

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外投資統計，國內核准對外投資金額於 2000 年達高峰（507,706 萬美元），之後趨於下降，到 2005 年最低，為 244,745 萬美元，2006 年又升至 431,543 萬美元，2007 年再升達 646,998 萬美元。核准對中國投資金額則於 2003 年達到高點（769,878 萬美元），接著二年趨於減緩，2005 年總投資金額降為 600,695 萬美元。但 2006 和 2007 兩年再提升至 764,234 萬美元和 997,055 萬美元。不過，台商投資中

國的核准金額近兩年雖再增加，但其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卻持續下跌，2004~2007年分別為 67.24%、71.05%、63.91%，以及 60.65%。

三、兩岸經貿投資——過度開放或不足、過度依賴或互補不足

儘管如數據所顯示的，台商對中國投資占總對外投資的比重近四年來年年下滑，但還是高達 60%以上，排名第一，遙遙領先他國家。這樣的數據究竟意味著，兩岸經貿投資是過度或不足？是依賴或互補？多年來兩種對立的說法爭論不休。

表面上，政府政策是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似乎是由管制朝向開放再到停頓，究其實都是在「開放程度大小」之間擺盪。不過，不管政府政策如何，三十年來兩岸經貿愈來愈熱絡似乎是一般人的共同印象。大體而言，由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品；由中小企業到大企業；由貿易往來到對外投資等等走向，應是兩岸經貿歷史過程的寫照。

由於兩岸間的複雜關係，再因意識形態的南轅北轍，台灣內部一直存在被冠稱為「本土派」和「親中派」之截然不同看法。前者認為兩岸的經貿關係愈熱絡，台灣經濟愈危險，「產業、資金被掏空」會是最後的結局，因而必須祭出管制政策來防止；後者則認為應順應全球化潮流，應善加利用中國的資源和市場，而近幾年台灣經濟還能維持不差的局面，就是拜賜和中國的緊密經貿往來。

由上文所列出的簡單數據，已被不少論者認為台灣對中國經濟已經「依賴過度」了。雖然到底比重多大才是「過度依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超過四分之一，甚至達一半以上應該是頗高的了，因而由貿易、投資和產品結構這三項數據顯示「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到底「過度依賴」的缺點何在？論者也舉出相對年度的失業率來比較分析，台灣的平均失業率，在 2000 年時還只 2.99%，2001 年就跳升為 4.57%，2002 年達到最高峰（5.17%），之後就回降。2003~2007 年，分別為 4.99%、4.44%、4.13%、3.91%和 3.91%。單以對中國投資比重和平均失業率兩種指標數據，在近幾年幾乎呈現亦步亦趨的正向變動而言，會有「台商西進讓台灣產業與經濟掏空，就業機會流失、失業率上升」的結論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這樣子的推論必須做進一步檢視，而且勞動市場是落後指標，況且 1996 年以來台灣勞動市場受「制度性」因素（特別是勞工法令）的衝擊頗大，加上台灣平均失業率的跳升比赴中國投資比重躍升還早了一年，因果正好與勞動面是落後指標、比較慢反應的理論預期正相反，可是我們卻不能輕忽「依賴」在兩岸間的意涵。我們知道，在自由民主社會裏，「交易」、「貿易」是自然出現的，而「分工合作」也是到處可見，自給自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說是「相互扶持」或是「相互依賴」都是可以的。所以「依賴」原本不應該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其實，「貿易依存度」一直就是表示兩國間貿易的熱烈程度，而我們也都清楚、明白，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國」，就是說台灣產品很大比例出口到美國，而日本則是台灣最主要的產品供應國，亦即台灣自日本進口很多東西。因此，說美國和日本是台灣經濟最「依賴」的兩個國家，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雖然多年來也都有「應該分散市場」的聲音出現，但都不是那麼的憂心。那麼，三十年來，在中國門戶開放、改革開放和放權讓利下，依「比較利益原理」，兩岸經貿逐漸熱絡，迄今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相對轉移到中國，為何就會有「憂心忡忡」的聲音出現？

再就「對外投資」來看，它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一種程度之後就會出現的自然現象，為何台商到東南亞或中南美洲國家投資就沒有「依賴、掏空」的顧慮，但赴中國投資卻有另番憂疑呢？1980年代風行中南美洲的「依賴理論」正可說明，該理論係以「人治社會」為背景發展出來的，亦即不論是貿易或投資，由當權者一個命令就決定「開放」或「停止」。當貿易或投資比重到某一程度時，基於政治利害突然喊卡，當事者的損失絕對慘重，於是「經濟人質」就出現了，亦即商人只能順從獨裁者的命令並依其指示行事，否則財產、事業，甚至生命都不保。那麼，當今的中國是否就是如此呢？

由2005年中國祭出〈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奇美企業創辦人許文龍的遭遇就可知一斑，許先生的飽受威逼利誘，在日本《產經新聞》該年4月26日刊出的「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長伊藤哲夫調查報告中已證實，這對其他台商的「寒蟬效應」不可小覷。本來世人期待中國在經濟自由有成效後會產生政治自由，而中共舉辦2008年奧運也會助其改善人權和促進體制改善，但2008年竟也出現韓商無視清算手續「乘夜逃跑」事件，而中共鎮壓西藏並乘勢祭起民族主義大旗致中國「憤青」不理性抗議法國家樂福、且重演文革紅衛兵鬥爭、抄家的伎倆。既然中國如今仍暴露其「人治、極權體制」的現實，在「政治干預、指導經濟」下，適用於自由民主社會的經濟原理在那裏就行不通，而「台灣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當然就不會是好事了！

撇開這種敏感的「政治性課題」不談，就是「純經濟面」，光是貿易摩擦和非關稅貿易障礙，就已非常棘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中國已是全球WTO成員中，遭受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中國官方的統計也指出，中國出口產業面對各國實施的非關稅障礙日增，其中即有高達60%的出口企業面臨其他國家實施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兩岸如何有效預防與因應貿易摩擦及各式的非關稅障礙，尤其台商應如何避免被波及，有必要未雨綢繆。

再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兩岸競爭力」訊息。那是多年來一直備受矚目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和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對中國的評比可說異曲同工。都在2003~2005年有志一同指出中國面臨「制度性危機」，就是出現「後發劣勢」。

2004年7月7日去世的華裔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的走向卓有深厚研究的楊小凱，早就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劣勢」，當技術模仿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物質經濟固然有所斬獲，但「人治」、「極權」體制卻鐵板一塊，中國依然抱持「共產體制」不放，想要實施不可能實現的「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知「民主、自由、市場」是成熟自由經濟的特徵，只有在民主法治體制下，生命財產才可得到保障，也才有明確的市場規矩可以遵循，進一步發展成「安和樂利」的社會也才有可能。

因此，除非中國趕緊放棄共產走向民主體制，否則「後發劣勢」是無法扭轉的了，IMD 和 WEF 的報告已予以證實，而中國的社會問題叢生其實也早已相印證了呢！「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應非虛言。那麼，熱衷西進的台商們，怎能不戒慎恐懼呢？

四、遠離中國正是時候

迄今出爐的各家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對於今明兩年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幾乎都是兩位數，亦即都高於 10%。我們知道，各預測機構都有計算公式且有所本，不過，預測所根據的各種假設及內外環境，會不會在短期內就有鉅大變化，非常值得商榷。

首先，自 1978 年底進行放權讓利改革，中國經濟成長歷程迄今已達三十年，在產量基數擴大下，欲維持兩位數的成長率，所需投入的生產資源也需增加，何況中國一向採取耗用資源的方式來促進成長。眾所周知，近期油價飆漲，固然有供給面因素在，但需求增加毋寧更關鍵，而中國經濟持續高成長應居要角。此外，國際原物料大幅上揚，中國需求也應是要因。未來中國會不會、能不能花更高代價且不計成本持續如此這般方式的保持高成長的格局，很值得懷疑。無論如何，對於全球經濟都不是好事，若維持高成長，對全球已然稀少的能源和資源勢必雪上加霜，至少通貨膨脹的陰影會擴大；若無法保持高成長，經濟崩跌也將引發其國內並波及全球的連鎖問題。

其次，中國的泡沫經濟早成國際共識，單由其高達一兆六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來看，其氾濫游資已是令人咋舌，再加上龐大國際熱錢的推波助瀾，真不知中共當局的宏觀調控還能抵擋到何時，無怪乎「2008 年北京奧運」會被認為是一個重要時點。亦即，最多拖到奧運就會大破滅。既然這已成為共識，有識者也早已磨刀霍霍，於是時程往前挪不是不可能，一旦洪水決堤，跑都來不及呢！

第三、經濟降速將導致史無前例的失業浪潮：中共總理溫家寶說，今年中共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兩防」（一是防經濟過熱，二是防通貨膨脹）。這標示著國家要明顯放緩經濟增長速度，緊縮銀根，搞產業升級、實行新勞動法。在此大勢下，企業的物價和營運成本加大，將使更多的企業選擇裁員，或者被迫倒閉破產，極有可能導致一次巨大的民眾失業危機。

第四、社會治安形勢危機四伏：當前中國兩極分化，官民對抗，社會不滿情緒加劇，黑社會興盛、治安形勢混亂，偷盜、搶劫、殺人等嚴重治安事件多如牛毛，群眾上訪不斷，「無利益衝突事件」此起彼伏，加之北京奧運臨近，包括西藏等各種社會力量都將藉機表達利益訴求，有的極有可能採取更為激烈的對抗手段與形式，因而社會治安形勢危機四伏。

第五、自然災害將進一步加劇：由於全球變暖造成乾旱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頻發，環境惡化帶來土地沙漠化。加之中國近些年來在「發展就是硬道理」誤導下的追求成長，導致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生態平衡被嚴重破壞。最可見的危機就是青藏高原雪災增厚導致積雪融化、三峽水庫的「適應」期和南方雪災對山林毀滅造成的天然調節功能失效等一系列效應，將導致今年北京奧運前後的天氣變化無常，極有可能引起洪水氾濫、土石流、颶風冰雹、海潮雷暴或乾旱病害蟲等自然災難。今年初的雪災和 5 月的四川強震災害已是斑斑明證。

第六、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由於政府拒絕普世民主與人權價值觀，故權力失去監督，言行不一，官方媒體充滿假大空言論，導致官府的立場講話，百姓很少相信。而治理危機則包括腐敗問題、法制建設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黨群關係問題、政府權威流失問題等等。

第七、政府困於外交危機：自去年以來，西方美英德法四大國在對中政策上的利益和觀點經過反覆協調，已取得一致。德國總理梅克爾與上台不久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和英國首相布朗的歐洲三巨頭之間共同點就是「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其國內外媒體幾乎一致將他們的外交政策描述為親美。眼下，北約東擴、亞洲化北約與全球化北約來勢逼近，這導致中共近些年來的遠交歐盟、制衡美國、聯俄拉印、約束日本等等，分化西方戰略，在總體上歸於失敗。為此，中國官方媒體不時發表抨擊民主陣營國家「價值觀外交」文章，充分表露了面對國際風向轉換，中南海已表現出明顯的意識形態焦慮。如今又發生西藏事件衝擊：國內輿論仇藏排外；國際社會抗議抵制。這更進一步彰顯了東西不同價值觀的衝突，並由此將導致 2008 年的中國政府陷於外交困境。

總之，中國的現實是：社會貪汙腐敗，兩極分化，官民對立，民怨沸騰，經濟下滑危險，政治事件不斷，民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府外交困境難解。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政府拒絕政治變革形成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將一一暴露出來，從而導致社會的綜合症、併發症爆發，將使 2008 年的中國社會陷於無法解脫的焦慮、憤怒與不安中。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管理方式與社會渴望變革內在衝動的矛盾激化，因而經濟危機與社會情緒最終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政治危機，即管治危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和分配危機。

因此，與中國的經貿交流可說已到一個重要轉捩點，是有必要嚴肅而認真的進一步探索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真相。那麼，台商要往何處去？最好的辦法是中國體制轉為「民主法治」社會，而建立台灣為「公平、公正、安全舒適生活和投資環境」，屆時「全球分工」自然就會導引台商往最適合發展的地方，根本不必煩勞政府從事規劃、保護。因此，全球人士一起來扳倒「中共」就是正路，而當前中國內部掀起「退（共產）黨」熱潮，迄 2008 年 5 月已接近「三千六百萬退黨退團」，顯示共黨倒台徵象已露，推波助瀾的良機不可錯過！在此關鍵時刻，台灣新政府應正視此種趨勢，冷靜理性的探究中國經濟真相，更不可掀起「新中國熱」才好！◆